

康有為詩文選



2 038 1785 1

康有为詩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101100000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947 字数281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2\frac{3}{16}$ 插页4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定价(4)1.20元



康有为影象

• 戊戌政变后在板榔屿摄 •

蕭寧不必
作自守

奏請圖勢老威

初陵之變

詔罷乙及時顯衍恭摺仰祈

聖鑒

臣等謹言事有越職之禁者可以定名分也國之有傳言

之典者所以探勢荒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探言以通天

下之氣

天恩蒙被應即入監讀書雖係疎賤比自祖父世受

恩惠區區之私常懷報德竊見方今外夷交迫自疏謀成在



康有为手迹

• 上清帝第一書原稿首頁。1888 •

前 言

『康有为詩文选』的編选出版，是为了紀念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十周年，同时也是运动的領導者康有为誕生一百周年。因为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戊戌变法运动本身有很大弱点，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本質上有反动的一面，所以一到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就使他墮落成为反动的保皇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这就不能不有所批判。

因之，我們編选『康有为詩文选』时，只选他进步时期的作品，除少数几篇特殊例外，一般不选他反动时期的作品。其次我們在注釋方面，也企图尽量闡明这些詩文怎样反映出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情形，康有为怎样用文学的武器为他所领导的进步的政治运动服务，运动中的做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錯的，以及詩文中的思想观点哪些在当时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應該批判的。我們还編了一个简单的年譜附录在后面，帮助讀者了解康有为由进步而反动的整个的一生。

魯迅先生說过：『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車上書的头儿，

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純正的先賢。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原是拉車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請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拉車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尙饜」了。」（『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我們所要紀念的，就是康有为的『趋时』和他所『趋』的那个『时』，紀念他的『拉車前进的好身手』；所要批判的，就是他的『拉車屁股向后』，批判他后来的『永定为复辟的祖师』。

二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对于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阶段，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自八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关于康有为那一派人物，毛主席还說：『……要救中国，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资产阶级的現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毛主席这个指示，是我們認識戊戌变法运动和康有为当时情况的最高指导思想。

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里面，对于戊戌变法运动，对于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他的政派的日益反动的发展，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作了深刻、全面的分析：

『中国人民曾經長期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統治下面。一百多年以前，外国资本主义

开始侵略中国，暴露了当时中国的封建皇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外来的侵略和压迫愈来愈厉害，国内的政治也愈来愈黑暗。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对外关系上实际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广大人民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了英勇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许多的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努力去寻找真理。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以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他们在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
社会制度。

『在一八九四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以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变法运动，就是这种企图的一次尝试。他们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变法运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他们的活动，在一八九八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了。』

『一八九四年中国的失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运动。同康有为一派改良变法运动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其他几个革命派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在康有为一派失败以后，它们在一九〇五年组成了革命同盟会。这一派和改良派不同，他们抱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就比改良派大进了一步。』

『清朝的统治，在革命势力迅速发展的情势下，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

欺騙人民和抵制人民的革命，在将近五十年前，清朝统治者宣布了「预备立宪」，并且在一九〇八年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綱」。这个「宪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虽然在表面上不能不許諾人民一些要求，但是人民不相信这种許諾是真的，不相信这种「立宪」能使中国进步。人民抵制了这种騙人的「立宪」。这个时候，对于这种「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場，而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则采取了拥护的立場。因此，改良派也受到了革命派的反对，并为人民所抛弃。」

康有为和他的政派的政治生命，到这时已經完結。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产生了中华民国之后，康有为已成为一个政治幽灵，但他仍然不肯退出政治舞台。他一直反对民国，到了一九一七年，积极贊助反动軍閥張勳，拥戴早被推翻了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图謀复辟，顛复民国。当时的形势，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說，「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这个观念的言論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因此，改良派人物也都不敢追随康有为，只有他个人墮落到公然与封建妖孽之流为伍。張勳的叛乱在全国憤怒声討之下迅速失敗，从此，康有为的生涯便在众叛亲离的孤独和黯淡之中告終。

三

刘少奇同志的总结，已經把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概括无遺。至于一些細节，則在本書的注釋当中，在附录的年譜簡編当中，都有比較詳細的介紹。这里只想着重談一談三个問題。

第一，关于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前面已经引过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毛主席还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書」，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分析当时的历史，可以了解这样几点：一、戊戌变法运动和当时康有为的思想之所以是有进步意义的，就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救国」，学习的目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二、康有为的思想，是自洪秀全到孙中山这一个系列中的一段，是自鴉片战争以来上层士大夫当中酝酿已久的改良主义思潮的一个总结，也是他以前许多先进人物不断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开花结果，他的大同思想明显地受到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梁启超一再歌頌他为「先时之人物」，「二十世紀新中国史之开卷第一叶」，「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无所凭借，无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諸哲相適合」（『康南海傳』），那是故意夸大，与事实不符的。三、但是，康有为改良派对于在它之前就出現了的、表面上也象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却并无继承关系。洋务派的目的，不是救国，而是要加强封建官僚統治，加强同帝国主义的勾結，促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本质上与改良派不同。戊戌变法运动中，洋务派尽管有时也与改良派成立过联盟，但总的說来，是站在反动方面的。四、改良派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造中国，固然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但也正

是它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因为「資產階級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連革命派都无法实现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改良派更加軟弱，只希望用請愿的手段向一个无实权的皇帝求得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資本主义的宪法，所以必然遭到失敗。五、但改良派所向往的西方，仍然会引起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当时反动派中的頑固派，害怕一切西方傳来的新事物，甚至把外国人已在中国筑成的一小段鐵路購買回来再拆掉。这因为在他們看来，这种西方傳来的新事物，是在动摇他們千百年因襲下来的封建統治的秩序了。

第二，戊戌变法运动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戊戌变法的失敗，并没有使西方的影响停止傳播。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魯迅先生有生动的回忆。青年魯迅于一八九九年即戊戌变法失敗后第二年，到南京进学校。他在矿路学堂的第二年，学堂的总办是个「新党」，維新的思想便在学生中大大流行，曾經是变法运动的理論基础的一部書，严复翻譯的英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赫胥黎的論文「天演論」，也就在这时被青年魯迅惊喜地发现，强有力地吸引住他。封建势力立刻来干涉了。「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严肃地对我說，而且递过一張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許应駟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餠、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朝华夕拾·瑣忆」)

可見，慈禧太后对变法运动的鎮压，能够迫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杀死了譚嗣同等六位烈士，罢

免了黃遵憲，吓退了嚴復，而已經傳播開來的先進思想對廣大革命青年的影響，却是無法扼殺的。青年魯迅通過這種先進思想的引導，在新的革命高潮推動之下，就遠遠突破改良主義者所圈定的範圍，走上了革命民主主義的道路。

第三，戊戌變法運動給予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劉少奇同志已經指出：革命派原來和改良派同時活動着，而「在康有為一派失敗以後，它們在一九〇五年組成了革命同盟會」。這情況，有些類似洋務派徹底破產以後，改良派接着登上歷史政治舞臺。變法運動對於後來的革命，直接、間接留下不少經驗和教訓。

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指出：「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幸免者。……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究其所究，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這就是戊戌變法運動，特別是它的失敗，對後來的革命最直接的教訓：要實現民主，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憲法，必須通過革命的武裝鬥爭，不能吝惜血的代價。而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尤其任何改革不相容，為實現國家的改革，非用革命武裝鬥爭把它推翻不可。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眞解決』里指出：「由滿洲人來將國家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意味着給他們以損害。實現改革，那他們就會被中國人民所吞沒，就會喪失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各種特權。」

但戊戌變法運動對於後來的革命，還有更深刻的教訓，這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當時所要實現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根本不可能；康有為所幻想的通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上實現大同，尤

其不可能。康有为的『大同書』早已写成，由于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现实的通路，视为渺远无期的理想，一直不敢发表；而到了后来公开发表，则已是用作反对民主、反对社会主义的武器，用意是表示：大同的理想我早就有了，但必须经过我所拟定的由君主立宪开始的道路，你们这样搞只是乱来一气，无益有害。

今天我们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还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迈进而斗争，国际上则是东风已经压倒西风，还将进一步压倒西风，大同理想的实现，不再是渺远无期的事。我们将要实现的大同，和康有为幻想中的大同，有根本的不同。这时我们纪念并批判戊戌变法运动和康有为，应该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才是人类幸福最高理想——大同理想的实现者。离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大同理想这样的先进思想，也会被歪曲成正好相反的东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今天我们国家里，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了。

四

康有为的一生，本书附录的年谱里面，已经介绍了一个轮廓。这里来画一个更其粗略的轮廓。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生于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卒于一九二七年，得年七十岁。他们的家庭，是一个世代官僚地主家庭。他的家乡，是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早的地区。他的青年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

界規模的瓜分殖民地的過程急劇進行的時代；是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老大封建帝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急劇進行的時代；是國際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時代；是中國農民革命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最高峰，仍然英勇不屈地掀起着不斷的革命浪潮，強烈沖擊着封建統治的時代。他幼年所受到的是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十九歲始從朱次琦受封建的『濟人經世』之學。但現實的刺激，國家的命運，使他對於傳統的文化學問發生懷疑，感到它的無用。二十二歲，通過張鼎華，才接觸到改良主義的思潮，同年又在香港親眼看到英國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地秩序，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對封建制度的優越性，從此開始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過程。

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中國慘敗，暴露出清朝統治者沒有保衛國家的能力，也初步宣告了洋務派官僚的『富國強兵』的口號的破產。康有為的改良主義思想體系正式形成。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康有為三十一歲，趁着在京應試的機會，第一次向清光緒帝上書，請求改良變法以挽救國家的危亡。這是改良派登上歷史政治舞台的前奏，也是鴉片戰爭以來醞釀已久的改良主義思潮由理論研究變為實際政治活動的第一次。這次上書為頑固派所阻，光緒帝沒有看到，康有為備受頑固守舊人物的嘲笑和攻擊。

從這時起，到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表面上宣稱不談政治，實際上從事於變法運動理論體系的建立，把改良主義思想同儒家學說結合起來，用改良主義的觀點對儒家學說作重新解釋，並在講學授徒的形式下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中國又一次慘敗，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次年，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

条約，出賣中國領土台灣，这就更暴露了清朝統治者的賣國投降面目，宣告了洋務派的徹底破產，瓜分亡國危機更迫在目前。康有为这年三十八岁，又趁在京应试的机会，联合了各省应试举人六百零三人联名上書請愿，反对馬关条約，提出了改良派的全部救國綱領，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書。这是历史政治舞台上改良派正式登場的第一幕。康有为还組織强学会，创办『中外紀聞』，全面展开組織和宣傳活动。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能看到。康有为接着第三次上書，光緒帝看到了。这个小就在慈禧太后的『訓政』之下，剛剛『亲政』不久，仍然沒有实权的皇帝，想利用变法来提高自己政治威望，向慈禧太后手里夺取統治权，对康有为的建議表示贊許。接着康有为又上第四書，又被拒絕代呈。这时頑固派发动了对改良派的攻势，結果强学会被查封，康有为出京。

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冬，德帝国主义强占我国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的計劃已經成熟，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这年四十岁，赶到北京，第五次上書，向光緒帝提出亡國危險的严重警告，又被拒絕代呈。这时有人保荐康有为，請光緒帝特別召見，『帝党』官僚領袖翁同龢也极力支持，几經曲折，排除了頑固派的百端阻撓，次年六月十六日（夏历四月二十八日），召見才得实现。召見以后，康有为又上第六、第七两書，又上一書請求正式宣布变法为国家根本方針（『明定国是』），同时組織保国会，进行政党性质的活动。光緒帝採納了康有为的建議，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即召見康有为之前五日『詔定国是』，历史上所称『百日維新』便从这天开始。

『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信徒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積極支持者楊深秀，以及他的弟弟康廣仁，是光緒帝所依靠來實行變法的中堅人物。但光緒帝無權任命他們有實權的高級官員，他們所獲得的，僅僅是直接向皇帝提出口頭或書面建議，以及起草皇帝的命令的權力。『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接連發布了六十多道『上諭』，推行各種『新政』。這些『新政』的內容，較之改良派所要求的綱領，已經打了不少折扣，而發布下去之後，普遍遭遇到各級封建官僚的抵抗，差不多都只成為空文。

以慈禧太后為首，以榮祿為中堅的頑固派，早就在布置陰謀，準備一舉而推翻全部『新政』，廢光緒帝。到了八九月間，形勢日益急迫。光緒帝和改良派求助於榮祿的部下軍官袁世凱，他們因為袁世凱參加過保國會，一直偽裝贊成變法，對他寄託幻想，希望用他的部隊發動政變，殺榮祿，除舊黨，幽禁慈禧太后。袁世凱偽裝接受這個秘密計劃，立即向榮祿告密，榮祿立即向慈禧太后報告，於是頑固派先發制人，於九月二十一日（夏曆八月初六日）發動政變，幽禁光緒帝，慈禧太后再度『政』，下令逮捕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百日維新』至此以失敗結束。

康有為於政變前一日逃出北京，梁啟超於政變後一日脫險；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被捕，九月二十七日（夏曆八月十二日），同在北京菜市口街頭慷慨就義，歷史上稱為『戊戌六君子』。

康有為逃出北京後，經香港到達日本，從此開始他十多年海外流亡的生涯，直到辛亥革命後才從日本回國。這十多年當中，可以大致分為兩個段落。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三年春，這中間，康有為

从日本到加拿大，到英国，回加拿大，又经日本、香港而到新加坡、檳榔屿，又到印度，直至离开印度为止，是一个段落。离开印度直到回国，是第二个段落。第一段内，康有为受英帝国主义的『保护』，来往地方不出当时英国势力的范围，住檳榔屿和印度最久。这一段内，康有为到处组织『保皇会』，用『保皇』的口号来同革命派争夺群众。一九〇三年春，荣禄死，康有为在印度闻讯，立即辞了英国的『保护』，赶回香港，希望光绪帝复辟，他也可以被召回国，同时发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正面反对革命。当时革命派宣傅家章炳麟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揭露他道：『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齟齬不了之语，以聳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从这以后，康有为成为革命的正面敌人，尽管清朝政府中的顽固派对他还是仇视，他的『复辟赐环』的美梦并没有实现。从这以后，直到回国，海外生活的第二个段落内，他漫游欧、美、非三洲各国，经过的地方极多，大致见本书附录年谱，这里不一列举。这些年中的世界漫游，并不曾吸取什么新鲜的事物来改变他的成了花岗石的头脑。鲁迅先生指出：『其实是一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南腔北调集·杂语』）一九一〇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康有为从檳榔屿回香港，又到日本住下来，不愿回到革命后的祖国，而积极进行阴谋，企图阻碍民国的建立，在『虚君共和』的欺騙性招牌下保存清朝的统治。

一九一三年，康有为才在『奔母丧』的名义下回到广东家乡，然后在上海和杭州住下来，始终不